

不敢冒尖。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。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，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，即大张布告，搞“四大自由”，既不请示，也不商量，这说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。他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，现在被说服了，积极了。

自古以来，创新思想、新学派的人，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，孔子二十三岁开始，耶稣有什么学问？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，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。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？不过高中程度。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（主义）论，年纪也很轻。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。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，不过三十岁左右，学派已经形成了。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。那时马克思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，如李嘉图、亚当斯密、黑格尔等。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。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，充满民主革命精神，以反满为目的。康有为亦是如此。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，死时才三十岁。王弼注《老子》的时候，不过十几岁，因用脑过度早死，死时才二十几岁。颜渊（二等圣人）死时才三十二岁。李安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，当了总司令，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，年纪不甚大，学问不甚多，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。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，就所向披靡。所有青年人总比不过他们的。罗成，王伯当都只不过是二十几岁。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，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，怕比学问。刊物出后，方向不错就对了。雷海余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相仗马列主义，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。现在我们要办刊物，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。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。刊物搞起来，就逼着我们看经典著作，想问题，而且要动手写，这就可以提高思想。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。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，尽讲抽象不标红。

各省可办一个刊物，成立一种对立面，并且担负向中央刊物交稿的任务。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。总之，十篇以下，由你们去组织。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。

自古以来，创新学派、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，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（事物）东西，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。而有学问的老古董，总是反对他们的。马丁·路德创新教，达尔文主义出来以后，多万人反对？安眠安眠药的，既不是医生，更不是有名的医生，而是一个司药。开始，德国人不相信，但法国人欢迎，从此才有安眠药。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。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，他是卖报的孩子，后来成了传记作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。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，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，不是把学校门都关了，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。看你方向对不对，去不去抓。学问是抓来的。从来创立学

派的青年，一抓到真理，就藐视古董，有碍发明，情学家就来压迫。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？我们开头搞革仿，还不是一些娃娃，二十多岁，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、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。讲学问，他们多，讲真理，我们多。

我很高兴，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。批评得尖锐性、生动性，把暑气一扫而光。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，不讲真心话。

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。彭涛的也好，有说服力。

尖锐性差一点，无非是“打击别人提高自己”，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。为了打击错误思想，提高正确思想，是完全必要的（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）。滕代远那一篇也好，但说服力不够，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，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。张奚若批评我们“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鄙视既往，迷仗将来。”

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么！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。不“好大喜功”，难道“好小喜过”？禹王堵寸阴，我们爱每分钟。孔子“三曰无君则惶惶如也。”孔子“席不暇暖”，墨子“实不得黔”，这都是急功近利。我们就是这个章程。水利、整风、反右派，六亿人口搞大运动，不是好大喜功吗？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，不是急功近利吗？不鄙视旧制度、反动的生产关系，我们干什么？不迷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？

我们错误是有的。主观主义也是有的。但是“好大喜功，急功近利，鄙视既往，迷仗将来”是正确的。天津、南京两封仗虽然是反对我的，但精神可取，我看是好的。天津的更好，南京的萎靡不振，骨气不硬。陈其通等四人，除陈沂是右派分子，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。当面不说，背后唧唧咕咕，这是不好。应该大体一致，至少要基本一致，可以尖锐一点，也可以委婉一点，但不能不说。有时要尖锐鲜明，横竖是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。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，只会使党团结。有话不说，就很危险。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，不讲策略也不行。例如明朝的三大案，反魏忠贤的那样不讲策略，自己搞消灭，当时惹得皇帝不喜欢，一个四川人杨镇安被充军到云南。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、屈原、朱云、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，为原则而斗争的。不敢讲话无非是：“一怕扣为机会主义，二怕撤职，三怕开除党籍，四怕老婆离婚（面上无光），五怕坐班房，六怕杀头”。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，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。没有精神准备，当然不敢讲话。难道可以牺牲，封住我们的嘴巴吗？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，使人敢说话，交心来。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说：要造成一种环境，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。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，要有王熙凤的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精神。

我们应当领导群众，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，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，当然和储安平不同，那是敌人骂我们，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。我们，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，有些话不敢讲，只讲三分，这是一怕不好混，二怕失选票。这是庸俗作风，要改变，现在已有可能改变。

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——多快好省，促进派，四十条。有三种人，三种心理状态：一种是痛心的，一种是漠不关心的，再一种是吹掉高兴，一块石头落地，从此天下太平。这三种态度的人，两头小中间大。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，都有这三种态度，反日、反蒋，土改是比较一致的，但是在台儿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，这种态度是不是对？

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，取得协议，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，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，是否用两三天时间谈一谈思想问题，谈一谈心里话？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，又不谈思想，实践诺言，是否有矛盾？一不搞斗争，二不划右派，和风细雨，把心里话讲出来，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讲，精神振作，势如破竹，象毛主席、鲁迅那样，敢说，把顾虑解除，要在地委书记的在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，搞出一种新气氛。邹容十八、九岁写了一篇《革命军》，直接骂皇帝。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，年纪越大用词越少，但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要鼓足劲，当然年纪大的也要，也要掌握。三国时刘备不好，还是老头子抖擞。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。

印了一些诗，尽是古古董。搞民歌好不好？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，回去以后，搜集民歌，各个阶层、青年、小孩都有许多民歌，搞几个来试办，每人发三、五张纸写写民歌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，限期十天搜集，会收到大批旧民歌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。

中国诗的去路。第一条民歌，第二条古典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，形式是民歌的，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。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。现在的新诗不成形，没有人读，我反正不读新诗，除非给一百块大洋。搜集民歌的工作，北京大学做了很多，我们未编可能找到几百万或千万首的民歌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，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。（完）

《湘江评论》摘录

《集学会之成立及进行》

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，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、伟大的事业都係一些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，我们住在这人繁复的社会，诡诈的世界，没有批评的精神，就容易会做他的奴隶。

北航 电工教研室翻印

67.2.27